

老
记
者
文
集

新
闻
忆
旧

重庆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忆旧/重庆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0.3

ISBN 7-5366-4597-X

I. 新... II. 重... III. ①新闻工作-回忆录-中国②新闻工
作-概况-重庆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0940 号

▲新 闻 忆 旧

重庆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 编

责任编辑 朱荣瑚

封面设计 王 多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5

字数 332 千 插页 4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66-4597-X/I·920

定价:16.00 元

重庆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文集编委会

顾 问:刘志忠 张文澄 冯克熙 雷 勃

主 编:滕久明

副主编:杨钟岫(常务) 刘庆渝 李华年

张小川 陈萸苗 李书敏 宋 愚

罗昌林 石大周 刘子茵

编 委:方家良 王 镛 王继槐 尹长征

李光儒 李忠禄 李晓枫 李鸿仁

陈兴芜 陈朝元 张开明 杨本泉

杨光鉴 蒲华清 戴永福 唐 林

赖炳福

编审组:杨钟岫(组长) 王 镛 石大周 刘子茵

(一)回忆录文集编辑小组:刘子茵(召集人) 杨本泉

李忠禄 杨光鉴 李天培

(二)论文文集编辑小组:王 镛(召集人) 王继槐

何鸿钧 柯柏龄 王 维

序 言

滕久明

旧与新，老和少，看似相反，实则相承。史实同新闻，因果互见；前辈及后进，教学相长。选编这两本老记者文集，意向是明确的：新闻忆旧，不忘前事；老记说新，推进改革。编辑这两本文集，应该说，是全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为新闻传播事业承先启后开拓前进，做了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

新中国建国五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市新闻工作发展很快。报刊增容添版，扩大发行；广播分台改频，开辟热线；电视上星上网，互促并进。这些发展变化，自然是现时在岗新闻工作者的劳绩，但也是和已离岗的前两辈老新闻工作者的奠基和开拓工作分不开的。据统计，已离岗还健在的老新闻工作者，全市有三百多人。无论从当代新闻史的征集着眼，还是从新闻工作经验及教训的吸取着眼，都是一大蕴藏丰富的活资料宝库。

在重庆的新闻史上，八年抗战，是一个鼎盛时期。那时，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汇集山城。他们自觉地团结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周围，形成强大的进步舆论，坚持抗击日本侵略，救亡图存。他们或者奔赴战场及敌后，在战火中用笔墨激励士气；或者留守后方，在敌机狂轰滥炸下报道，振奋民心。发扬了爱国精神和敬业作风。

四年解放战争时期，争取和平民主建国的进步势力与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之间的殊死斗争，在重庆新闻界表现也十分突出。特别是在《新华日报》被迫撤离后的两年里，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时刻，进步记者们坚守岗位，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以上两个时期，都属新中国建国前的新闻史料，从那时来的老记者，健在的也很稀少了。尽管在这两本文集里刊载的这方面的回忆录或论述极少，但这也弥足珍贵的了。

1949年末，重庆解放。从老区来的新闻工作者和重庆原进步记者群中一部分人会师，组成了新中国建国后重庆的新闻阵线。现在，他们和由他们培育出的新重庆的前两辈记者，都先后届龄退休了。但他们筚路蓝缕以开拓新重庆的新闻事业，虽也曾经经过一些曲折，却终于蒸蒸日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更见欣欣向荣。收入这两本文集中的，主要都是他们这五十年间的经历和经验。

1950年，解放后的西南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重新创刊于重庆。1952年重庆市委的机关报《重庆日报》创刊。新华通讯社重庆分社的建立和播发新闻，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的机关报《西南工人日报》等相继发行，新重庆的文字传播媒体便在解放后的一两年里，逐步建立。西南的人民广播事业是在蒋政权撤退时大破坏的废墟上重建和发展起来的，并且逐渐从电波传声到电波传播声像。改革开放二十年来，随着经济的繁荣，重庆的新

闻事业也有大跨步的发展。晚报、晨报和各种专业报刊的创刊并不断增版，广播和电视从城市扩展到山乡，进入了千家万户。一个现代化的多层次的传播体系，日趋完备。这五十年里，一批从旧时代过来的新闻工作者成熟起来，一批新时代培育起来的新闻工作者成长起来。他们又次第进入老年，退下工作岗位。他们都是五十年来新闻历史的见证人，更是五十年新闻工作的实践者。他们的回忆录和论说文，在生动活泼的事例和恳切的说理中，反映了重庆新闻事业的发展轨迹，体现了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尽管收入在这两本文集里的不少的文章都是一些点滴的回忆和见仁见智的漫议，但集腋成裘，从总体上涵盖了传播媒体的方方面面。更为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从中窥见老新闻工作者们敬业、求实、艰苦、清廉、严细和创新的作风，严格要求自我的作风，孜孜不倦追求打好理论路线、政策法纪、群众观点、广博知识和新闻业务等扎实根底的精神，都足以供我们在岗的新闻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谨以此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献礼。愿 21 世纪的新闻工作在发扬光荣传统基础上更加繁荣兴旺。祝老新闻工作者们健康长寿。

一九九九年仲夏

目 录

序.....	滕久明 (1)
开国大典采访侧记.....	李廷瑛 (1)
在山城办报.....	雷 勃 (10)
摇篮曲.....	王继槐 (25)
我第一次当记者.....	陈嘉祥 (34)
编采杂忆.....	艾白水 (37)
采访忆趣.....	游仲文 (45)
记者生涯杂忆.....	陈明信 (53)
忆家柳.....	杨光鉴 (63)
我遇到的几个“第一次”.....	戴永福 (66)
青海牧区采访忆趣.....	柴志良 (72)
采访万里长江第二桥.....	宁梦龄 (77)
知心·求实·思变.....	王继槐 (81)
夜奔跳蹬公社.....	刘子茵 (94)
除夕夜, 没有月亮.....	杨世元 (98)
被“领物单”领去的记者.....	刘子茵 (102)

关于《较场口今昔》	文履平 (106)
从《讽刺与幽默》到《穿山甲》	马 丁 (110)
党报为我申冤	
——回忆吴丙然冤案的申雪	李远举 (116)
我为啥写《喜乘农村夜班车》?	汪大波 (121)
我当了一次“导演”	
——为剧人名医重续烽火情谊	肖鸣鏊 (124)
山城人民需要一张晚报	
——重庆晚报创刊初期的回顾	王 鏞 (128)
风雨十年路	
——记《重庆晚报》创刊十周年	刘子茵 (136)
深入现场和现场背后的深入	
——大溪沟罗家院下水道爆炸事故的采访 ...	黄铁军 (149)
倾注感情写新闻	黄铁军 (152)
在《重庆晚报》的日子	石大周 (158)
为新体制脱颖而出高唱进行曲	王继槐 (168)
访英归来	刘文权 (173)
四改标题	杨本良 (181)
笑看铁水奔流	柴志良 (183)
人民广播山城第一声	陈寰、朱芹曾、翁斯英 (189)
创业的年代	
——回忆建国初期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	李忠禄 (193)
转播成渝铁路通车典礼	钱辛波 (196)
采访忆旧两则	韩继昌 (199)
庆寿建言	
——记重庆广播电视报创刊 40 周年	李光儒 (204)
广播新闻快的背后	韩继昌 (207)

文史广播新花（三则）	杜全芳（213）
莘路蓝缕忆重庆电视	周宗贤（219）
几则轶事忆电视	谭人华（224）
洪水冲出了重庆电视台	周宗贤（230）
重庆摄制电视片的几个第一部	柯柏龄（233）
五年广播电视工作的几点回顾	李书敏（238）
重庆经济广播电台诞生记	吴孝文（244）
重庆经济台 西南第一声	王友义（249）
重庆有线电视在“四争”中成长	梁春屏（256）
牛翁剪影	余薇野（261）
一杨说二李	
——广电老记者李光儒与李中禄	杨钟岫（264）

编辑大师，德业永存

——记老报人张友鸾	陈理源（267）
我是《新民报》的“站读”和“走读”生	
——记者生涯漫忆	李廷瑛（274）
一个“甲子”	雷 勃（282）
我和《新华日报》在一起	黄友凡（289）
访问延安忆旧	周本渊（298）
扬鞭回看烽火路	
——山城新闻忆旧	杨钟岫（307）
回忆《民主报》	冯克熙（319）
一段难忘的采访生涯	王珂琳（336）
孟良崮战役的“支前”采访	雷 勃（338）
在《时事新报》的日子	张天授（343）
监狱内外	
——忆“六一”事件	陈理源（348）

卅三沧桑话“六一”	杨钟岫 (364)
历史长河中的小浪花	
——回忆 1947 年“六一”大逮捕	王珂琳 (378)
采访国际女间谍、大汉奸川岛芳子	张定华 (385)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重庆解放前后的《国民公报》	李光儒 (395)
借屋子躲雨	
——记解放前夕《新民报》的“改组”	何鸿钧 (404)
难忘一页	张定华 (416)
跋语	杨钟岫 (421)

开国大典采访侧记

李廷璞

1949年9月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亦称“新政协”）第一届第一次大会在解放才几个月的北京隆重召开。解放区各大城市的记者云集北京。采访政协大会并登上天安门城楼采访的记者限定24个名额，其中只有苏联塔斯社和意共《团结报》两名外国记者。到京全部记者集中住招待所，以便未参加大会的记者向进入怀仁堂的22名本国记者作“间接采访”。《新民报》是民办报纸，参加采访的记者须由两位政协委员推荐。当时我是由赵超构、浦熙修两位委员（均为《新民报》人）推荐参加采访的。关于政协大会及开国大典的主要报道，由新华社统一播发；我的任务是按新民报的风格，从侧面观察，为京、沪、宁三处新民报“摄”取珍贵的“花絮”新闻。回首往事，忽忽已历半个世纪。旧闻新记，或许能对当时领导人之间的融洽、协同、新兴、祥和的

动人气氛的那段历史，多少起一点拾遗补缺的参考作用。

勤政殿，人民坐江山

勤政殿是一座只能容百把人的小殿堂，“短命皇帝”袁世凯即在此“登基”。“新政协”最后一次筹备会在这里举行，其历史意义极不平凡——它为行将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催生，一轮红日将从东方喷薄而出。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早已过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也即将成为历史，几亿人翘首以待的“人民坐江山”的憧憬终于成为现实。以中共代表为首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济济一堂。郭沫若、张澜、沈钧儒、李济深等著名的民主人士老先生们，比记者先到会场，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毛主席来了！”民主人士纷纷离座，从会场簇拥着走到门外签到处迎接。毛泽东欢快的笑语，充分流露出满心的喜悦：“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何必这么严肃？大家都应该笑啊！”老先生们被感染得笑容满面，围观着毛泽东握笔蘸墨，在签到簿上用他那别具一格的书法写下了他的名字。

会间，休息、照相。代表们鱼贯出场，来到外面的小场子上，在木椅上各就各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最后相偕出场。当毛泽东走到座位前的空地上，老记们不失时机地将他包围起来。他笑容满面，和颜悦色地与记者随意交谈。有的记者在“重庆谈判”时与他见过面，也算是“老相识”了；其他记者与毛主席如此亲近地站在一起，如此随意地交谈，确是采访生涯中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与我两次握手，第二次握手后，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好多岁哪？在哪里报馆工作？”我回答以后，他说：“《新民报》好发达啰，像新民主主义一样发达。”《大公报》女记者高汾说：“毛主席，你长胖了，比重庆谈判的时候胖了。”

毛泽东微笑仰头，挥着右臂：“那个时候，蒋介石压迫我们。现在，八路军把他打败了，空气好了。”毛泽东心情极佳，看了一下高汾的鞋子，打趣地逗问高汾：“你脚上穿的鞋子，在上海叫什么名字？”高汾答不上来，毛泽东自问自答：“这种鞋子，在上海叫‘空前绝后’。”

谈得高兴时，毛泽东从中山服下兜里掏出香烟，划燃火柴，美美地吸起烟来。这时，服务员来到他跟前：“毛主席，照相了。”这才使他解除了记者的包围。

毛泽东坐在第一排当中的木椅上。我注意到他将吸了几口的香烟掐灭，放到椅边地上。照相一瞬即过，记者再次将他包围起来，他又划燃火柴，抽那截从地上拾起来的烟蒂，毛泽东的普通人形象、举止，至今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怀仁堂，人民政协的诞生地

中南海怀仁堂，是一座内部呈圆形的会堂，座位不超过一千个，政协委员（当时不称“委员”）大约六七百名，济济一堂，气氛祥和，一派新气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首都北京、国旗五星红旗、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里讨论通过，载入“共同纲领”的。这次大会最主要的历史意义，是在于它制定了《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雏形。半个世纪只是历史的一瞬，当时的政协委员绝大多数如今已经作古。现在，政协正日益焕发出参政议政的新的光辉。抚今追昔，第一届第一次政协大会参政议政的重要决策，当载入史册，永志不忘。

这次大会的规模和进行方式（如，没有分组讨论）与现今的政协自是迥然不同，但它却具有独特的历史色彩。

每次开会，代表们先行入座。记者席设在主席台下两侧，每边分两排安放 12 张小“课桌”，24 名记者的采访工具只是一支笔和笔记本，来“摄”珍贵的历史场景；拍纪录片、照相另有专人。每当那个年轻的女同志手捧茶杯、烟灰缸送到前排正中的桌子上（专供毛泽东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几位中共高级领导人就会随着入场。会议进行中，常见毛、刘、周、朱面露笑容，相互侧身倾首，低声“交谈”。

没有分组讨论，有的只是大会发言。小小主席台上，除了一支立着的麦克风，空无一物，与现今大会主席台的情景大不相同。十多天的大会，各界政协代表发言踊跃。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两位代表：一是刘少奇，是唯一站在麦克风前边发言边抽烟的人。他似乎烟瘾颇大，一支接一支地抽，吞云吐雾，“嘘嘘”之声，通过麦克风，清晰可闻，这大概是在延安窑洞中工作时养成的习惯，可谓“名士风流大不拘”，显示出他朴实无华的性格。第二个人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1935 年在南京，我是高中学生，看过舞台上的梅兰芳；1949 年 8 月在北京，第二次看见舞台上的梅兰芳，演的都是《霸王别姬》中的虞姬。那天才见到主席台上梅兰芳的庐山真面目。合身的藏青毕叽中山服，发色光亮，一口纯正清晰京味十足的普通话，端的是罕见的美男子。据说在日寇占领上海期间，他留着胡子，坚决不为敌寇唱戏，如今堂堂正正地挺立在主席台上，为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讴歌。多年梦想，终成现实，严肃、朴实的语言，流露出他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真情。

大会始终在既严肃又轻松的气氛中进行。怀仁堂会堂四周，是一间间环绕相连的小休息室，备有烟、茶、点心，供代表们会间休息时享用。这时，代表们旧识新交，随意攀谈，那情景略近于现在的“分组讨论”。

会期，在怀仁堂开过一次晚会。只有一个节目：由“四大名

旦”之一的程砚秋主演的《荒山泪》。剧中只有两个角色——贫妇和她的女儿。剧情是母女俩不堪官府的横征暴敛，逃避荒山，诉说苦情。知情人告诉我，毛泽东很喜欢这出戏。晚会这一节目是由他亲点。这大概与他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心分不开吧。怀仁堂除第一排有桌子外，全场只有木椅。当晚在每个座位地上准备了汽水，在那时的条件下，服务也可谓周到了。

逃亡台湾的蒋家王朝眼见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在即，自然不甘心服输。在北京，秘密战线的斗争相当激烈。当时我从知情人士处得知一些情况。为了保证政协代表的安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宾馆都安排了为数众多的保卫人员。代表们游公园、逛商店，皆有人暗中保护。在宾馆聊天时，我对白杨、浦熙修说：“你们玩得开心，可知道有人随时保护着各位代表呢！”两位女代表却不以为然：“我们又不是大人物，怕什么？”

在中南海附近，国民党特务开了“理发店”，我保卫人员便成了理发的“顾客”；在小胡同里，敌特盯跟前面的保卫人员，正要从腿上拔枪时，尾随其后的保卫人员眼明手快地举枪大喝：“站住！不许动！”确像荧屏上的惊险镜头。

已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建国前居住上海。为了迎接她到北京参加政协大会，对她的住所、陈设和生活用具，都作了极仔细的安排。这次的安排，是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作出的。周恩来真把统战工作做到家了。

一天，在散会后，宋庆龄兴冲冲从怀仁堂出来，坐进车里，叫司机送她到东安市场。这突然的“任务”，并没有难倒聪明、机智的司机，他一拍脑袋说：“唉哟，我这人记性差，车钥匙忘在里面了。”他急忙返回怀仁堂，打电话向公安部汇报。公安部长罗瑞卿火速布置了保卫人员。宋庆龄在东安市场逛了很久，买了她喜欢的东西，才回到她住的院子。保卫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据悉，在开会期间，罗瑞卿每晚都向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通报情况，李维汉则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每晚都要等听完汇报，才放心睡觉。他为统战工作付出了多少心血，于此可见一斑。

在天安门城楼上

横穿北京的长安街，紧傍着天安门城楼下的玉带河金水桥。它的南面原来并没有广场，天安门广场是在建国前短短几个月内“突击”兴建的。与长安街相垂直，是两片红墙绿瓦的长墙，两行古树依墙而立，当中一条石路，想来是文武百官入紫禁城上朝的必经之道。雄伟的天安门，旧貌换新颜，是历史的必然性；而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广场两边的庞大建筑物，则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标志。

1949年9月30日深夜，我正在编辑部为副刊发稿，但闻隆隆之声由西而东，从长安街方向隐隐传来——是驻扎西郊的解放军部队（包括坦克和装甲车）乘夜调往东郊，为翌日开国大典阅兵作准备。10月1日，曙光初露，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队伍便开始从四面八方进入天安门广场。采写新政协的24名记者争先登上天安门城楼；陆续来到的是各界最具代表性的知名人士，其中主要是一百多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随后登上城楼。

广场上黑压压50万群众；数不尽的面面红旗。这肯定是世界上最为壮观的场面，恢宏壮丽，令人目不暇接，直把人眼睛看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庄严宣布的这个历史镜头，将与世长存。

开国大典的检阅总指挥为聂荣臻；由朱德总司令检阅。毛主

席讲话后，聂荣臻站在敞篷吉普上，从东长安街驶上金水桥，向朱总司令行举手礼。朱总司令答礼后，步入城楼，向毛主席敬礼，阅兵开始。步、骑、炮、坦克、装甲车由东而西；空军战机（为数很少）循同一方向，掠过长安街上空。此时，万众一心：“这是人民的军队，这一切我们都有了。”著名的通俗哲学读本《大众哲学》作者艾思奇与我并肩站立，当骑兵部队方阵通过时，艾思奇以哲学家的幽默，“考问”身旁的将军：“什么叫骑兵？请你下个简单的定义。”将军一时被“考”住了。艾思奇：“骑兵就是‘步兵加马’，对不对？”将军开怀地笑了：“毕竟是哲学家，定义下得的确很‘辩证’。”炮兵部队通过时，将军深有感慨：“长征时，我们仅有不多的火炮，还是拆下来抬过雪山的。你们看，这些用汽车拖着的大炮！今非昔比啊！”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现在，人们花点钱买张票，登上天安门城楼，放眼广场。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当令人产生无限遐想。

天安门广场上的“花絮”

新中国的成立，埋葬了几千年的封建和几十年的法西斯统治。这时，历史要求塑造一座丰碑来纪念流血牺牲的中华儿女，实在是合乎情理顺乎潮流的。

南端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天安门广场上第一座建筑物。纪念碑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建立的。开国大典后不几天，举行了纪念碑奠基仪式。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陆续到达基地；记者群集一旁，作现场采访。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到得很早，在基地附近来回走动，亲作指挥。从美国回来参加政协、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著名侨领司徒美堂，时已年逾古稀，老先